

# 我的 性学之路

刘达临 / 著

WODEXINGXUEZHILOU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戏剧出版社

# 我的

刘达临 / 著

# 性学之路



WODEXINGXUEZHLU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戏剧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性学之路/刘达临著 . - 北京：中国戏剧：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9

ISBN 7-104-01415-2

I . 我… II . 刘… III . 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6279 号

责任编辑：沈 梅

特邀编辑：常 军 吕映辉 牛文星

**我的性学之路**

**刘达临 著**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沈阳新华印刷厂 印 刷

250 千字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11.75 印张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000 册

---

ISBN 7-104-01415-2/I·565 定价：27.00 元

## 杨澜专访：

### 关于“性”的话题(代序)

作者说明：1999年10月19日，我国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杨澜在我的性文化博物馆中采访了我，交谈了许多有关性的问题，这个半个小时的电视节目后来在香港凤凰卫视播出，其纪录收集在不久前出版的《杨澜工作室》中。我认为，这次谈话较好地反映了我对社会生活中性问题的看法，以及我为什么走上性学研究道路，并决定为此而献身。故转载于此，作为代序。个别文字有修改。

**在** 互联网上什么样的话题点击率最高呢？不同的国家做过的多次调查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那就是“性”。性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不过在多数公开的场合，人们对此讳莫如深。在中国，由于教育的不足和封建观念的影响，很多人的性知识非常地缺乏，甚至是相当地错误，而很多家长也不知道应该对自己的孩子怎么样正确地解释性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人们的性行为却从过去相当禁锢的状态迅速地滑向另一个极端——性泛滥。特别是黄色产业的泛滥，让政府和很多关心社会风化的人士头痛不已。为此我走访了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

刘达临先生。刘先生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一直致力于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人们的性行为，特别是他在 1989 年～1990 年间，发起和组织了 2 万例的性调查，可谓是中国性调查的开先河者。这几年，他也利用自己的积蓄和民间的支持在上海开办了性文化博物馆，我们的采访就在那里进行。

**杨澜：**首先说到青少年，他们在生长期的时候会慢慢地对性感到有兴趣。但是按照我们中国人一般的习惯，父母是不会跟孩子，或者老师也不会跟孩子去谈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会说“你长大了自己就懂了”，甚至是用各种各样编出来的话去骗孩子。这样的现象在你做全国性调查的时候，是不是发现存在得比较普遍呢？

**刘达临：**我觉得这个问题目前很突出，主要是一个观念问题。我们这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传统的观念都认为性是不能说的，说了是难为情的事，不雅的，甚至是非常肮脏的。这种影响从儿童青少年时代就开始了，从儿童时代就开始受熏陶。比如说小孩很好奇，经常问父亲母亲一些有关性的问题，但是他本身没有意识到这个是性问题。他问：“爸爸妈妈我是从哪儿生出来的？”很多孩子这么问，于是父亲母亲就骂他了：“你问这个问题干什么？胡思乱想，再问揍你。”小孩吓得不敢问了，但他的脑子里还是在想。

**杨澜：**他还是会去寻找答案的。

**刘达临：**对。“爸爸妈妈为什么不肯回答我？”这个问题很神秘，反而更想了。小孩有一些无意识的动作，有时候父亲母亲也阻止他、责备他，而这样的效果却适得其反。比如我过去

收到过一封来信，他说他是一个编辑，他的小女儿 6 岁有手淫的习惯，有时候喜欢用阴部在桌子角上蹭，有时候躺在床上喜欢用手摸。他们就骂她，不许她这么做，但是总是阻止不了，越来越厉害。他们问这个孩子：“你为什么要这样？”小孩说：“我憋不住。”他们就问我应该怎么做。我说：“千万不能骂，你越骂越强化了。”我们叫强化性心理刺激。她本来是无意识的，一骂她，她表面上不敢做了，心里更想做。

**杨澜：**1989 年 ~ 1990 年您做的 2 万例的首次中国性行为的调查中有一个数字，比较出乎我的意料，这里面就谈到在调查的已婚的夫妇当中有 44.5% 的城市夫妇， 33.4% 的农村夫妇表示对他们的性生活不满意。而女性的数字更高，城市里的妻子有 71% 、农村的妻子占到 76% 对性生活都不满意。

**刘达临：**对。

**杨澜：**这说明了什么问题？那就是说大部分的，或者说接近一半的婚姻是夫妻双方都不满意，甚至高达 70% 的女性都对他们的性生活不满意。这对于社会来说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

**刘达临：**是很严重，这里有很多问题。一种是观念问题，什么观念呢？现在中国还有很多男人是大丈夫主义，他觉得“过性生活是我做丈夫的权利”，所以他不太考虑女方的意愿，他想来就来，想做就做，而且不是按照科学的方法做。他有一种观念就是“要以我为主”，所谓“娶来的老婆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还有要做也不是按照科学方法做，比如说美国现

代的性学权威马斯特斯、约翰逊夫妇，他们在 60 年代提出了完美的性生活该有 4 个阶段。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讲，很少有人知道。

**杨澜：**哪 4 个阶段呢？

**刘达临：**第一就是要有兴奋期，双方要有必要的爱情的接触，接吻、拥抱，来激发双方的兴奋，只有双方兴奋了才能做。第二叫平台期或者叫持续期，就是进入性交，通过连续不断的动作积累快感。第三是性高潮期，双方达到性高潮。第四是消退期，就是性高潮以后并不是马上结束，还要有必要的消退，女性还继续得到男性的爱抚，然后慢慢……平静下来。这 4 个阶段是完整的一个过程。但是中国人现在很少懂得这个，有些丈夫说来就来，他兴奋了，老婆还没兴奋。有时候男方达到性高潮了，他不管女方达到没达到。还有结束以后，性高潮以后，男方就不管女方了，呼呼大睡，女方就感觉到很不满，“你满足了，就不管我了”。长期的积累，使女方感到过性生活就是满足男人的事情。

**杨澜：**过去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谈到性的问题就觉得是男人的事情，女人只是……比如说为了承担妻子的责任，或者是为了生育后代才介入。而且传统的教育认为，包括像在英国比较保守的教育也是这样，认为一个淑女或者说一个有教养的女人是不应该从中得到快乐的。

**刘达临：**是这样的。比如说我曾经收到一封信，也是来向我咨询的。一个男性很难过，他说：“我的性生活过得一点没意思。”他说他每次跟他太太过性生活的时候，她就直挺挺地

躺在床上，像个木头人一样，什么反应也没有，太没劲了。为什么女方没有反应呢？一个原因可能是他方法不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像你讲的，很多女性感到，“我是女人，我如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反应很强烈，或者主动要求，那人们会看不起我，丈夫也会看不起我。”

**杨澜：**认为是一个坏女人。

**刘达临：**认为是个淫荡的女性，所以她就压抑自己，压抑的结果使自己不能够充分享受性的快乐。

**杨澜：**如果有 44% 左右的城市家庭，还有 33% 左右的农村的夫妻都对他们的性生活感到不满意的话，那么这样一个数字跟其他的国家一起来比较，这个数字是特别高？还是基本上相同呢？

**刘达临：**应该说高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数字反映了一种进步。

**杨澜：**怎么是进步？

**刘达临：**因为……我打个比方，如果说你周围的人都吃青菜萝卜干，你根本不知道有鱼、有肉存在，你会很满意。但你知道还有鱼、有肉以后，你就会对一天到晚吃青菜萝卜干不满意了。像过去，如果我早几十年问他们，他们都会说很满意，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性的乐趣是什么。他们现在有点懂了，有点受外界文化的影响了，他们觉得“我应该是快乐的，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感到不满意了。这既反映了他们处境的不好，

又反映了一种进步。

**杨澜：**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很多人认为得了性病是很肮脏的，见不得人的，所以他们宁可去找江湖郎中，试一试民间的偏方，也不愿意到大医院里去接受科学的治疗。在香港我采访了亚洲性学联合会的会长吴敏伦博士，他就指出，在性病求诊的人数当中，男人占了绝大多数，而实际上性功能方面的很多问题主要是来自心理的障碍，所以特别需要男女双方的配合。不过社会上存在的有一些问题恐怕就是医生们也无能为力的，那就是黄色产业的泛滥。人们不禁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商品社会是不是什么都可以拿来交换，包括人的肉体和尊严呢？据一些专家的估计，现在全国从事卖淫活动的人数可能会达到千万左右。这是一个非常耸人听闻的数字，但同时可能也反映了比较深刻的社会问题。实际上现在中国也正处在一个价值重塑的阶段，在这种商品经济、金钱的冲击之下，人们对于性的道德观念非常混乱。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去遏制继续泛滥，还是说根本就没有办法呢？

**刘达临：**我觉得目前或者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太有效的办法。卖淫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观念的问题，它还是一个古老的职业。过去不那么泛滥，特别是到了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当时用政治的力量，用政府的力量把它取缔了，但是几十年后又起来了，而且蔓延了，并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在全国非常大的范围蔓延。

**杨澜：**也进行过不少次“扫黄”的活动，但有的时候也是越扫越多，你把这一批送走了又来了一些新的，甚至据说有的地方公安局的人也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于

是干脆把她们送到邻县、邻省去，好像自己看不见了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刘达临：**卖淫是一种社会病，它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就像人类身体的疾病一样。我们治病有两个方法，一是治本，一是治标。像你发烧了，可以治标地压一压，但是本源的问题还要解决。卖淫也是一样的。我们“扫黄”什么的，我觉得都是治标的办法，用行政手段，用政府的强大力量来压一压。但是它的本质问题、文化根源、经济根源、很多根源还是要更深入地挖掘的。

**杨澜：**比如说这个根源在哪儿？

**刘达临：**为什么自 80 年代以来，这 20 年当中会那么泛滥？我觉得跟当前发展商品经济是分不开的。发展商品经济是有它固有的规律的，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什么都可以变成商品，知识、劳动可以用来交换钱。

**杨澜：**权力也可以变成钱。

**刘达临：**对。有权，他可以用权力来转换成钱。但有些人又不肯劳动，又没有知识，又没有权，又想得到钱怎么办呢？特别是对那些妙龄女郎，她怎么办呢？最简便的方法，用她的青春、她的身体来交换钱。我觉得这个根子非常深。还有像一些暴发户，他有钱了，但是他的精神文明没有上去，他的文化素质没有提高，他有钱了就要享受，一个就是大吃大喝，最原始性地吃喝，还有最原始性地玩女人。所以现在卖淫嫖娼没有嫖就没有卖，没有人买这个东西就没法存在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问

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西方有人说过，如果不把男人头脑当中这种把女人当做玩物的思想彻底消除的话，玩弄妇女的现象，强奸行为，嫖娼行为，就会永远存在。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杨澜：**有一次跟一位社会学家在聊天的时候，他也谈到，如果说下个世纪，中国面临一些什么样的挑战的话，他认为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可能就是性病的泛滥。你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刘达临：**我同意。

**杨澜：**因为当这么多的……比如说地下黄色产业没有得到控制，或者甚至这些人对于基本的医学或者生理的常识都是无知的话，那么性病传播起来会是非常恶性和非常急剧的。

**刘达临：**现在卖淫现象是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但是我觉得中国这个问题可怕的程度，一个在于它以很快的速度蔓延泛滥，还有一个可怕的问题就是毫无防范。对多数卖淫妇女来说没有防护，很多农村妇女，很低层次的妇女她们卖淫就是……我们说得白一点吧，就是拉了裤子就干的。这样子不得了，贻害自己，贻害对方，也贻害子孙，不得了。我们政府过去在 80 年代对性病问题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而到了 90 年代，特别是这几年，对性病、艾滋病的防护是予以高度重视了，这个问题是不注意不行了。下个世纪这件事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杨澜：**中国的艾滋病患者成倍地增长，新世纪的中国面

对性病的挑战。现在中国的艾滋病患者的人数每年在以一种什么样的速度递增呢？

**刘达临：**是以一种加速度在递增，那是很可怕的，它不是说增加百分之几十，而是成倍地增加，不止一倍地增加。10年前，在欧美这些国家它是很泛滥的，上升得很快，但现在上升速度已经减缓了，已经降低了。而像亚洲国家……

**杨澜：**东南亚这些国家和地区。

**刘达临：**东南亚国家包括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也包括中国，现在都在成倍地增长。所以估计到下个世纪，全世界的艾滋病的重点不是在欧美，而是在亚洲。

**杨澜：**那在东南亚国家的做法中有什么我们可以借鉴的呢？

**刘达临：**像泰国，过去因为它的色情行业比较泛滥，所以性病、艾滋病也比较泛滥。最近这几年他们抓了，狠抓，比较有成效。

**杨澜：**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刘达临：**他们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大力推广安全套，因为他们那种社会组织人们去反对色情活动是很难的。他们这个措施非常……政府花了很多的力气。还有印度尼西亚有一个卫生部长，人家称他“安全套部长”，因为他经常在电视上强调这个。这个问题在中国有点阻力，中国很多人认为“你推广安全

套，他就安全了，可以乱来了”！

**杨澜：**这不是鼓励人家了吗？

**刘达临：**“他就安全，他就无后顾之忧了，他就可以乱来了”，当然也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在我们中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提高道德观念，加强教育，使他们不做这个事。第二步，如果说有人一定要做，那么你就戴安全套。印度尼西亚那个所谓“安全套部长”在电视里面说：“第一，我希望你们做好孩子，不要乱来。第二，如果你们实在控制不住的话，我请你们一定要戴安全套。”

**杨澜：**您十几年前从一个研究婚姻家庭的社会学家，然后到对人们的性行为进行研究，从您的研究态度也能够看出人们对于性的观念在发生变化。如果您要比较一下十几年前，您刚刚开始这方面的研究所遇到的阻力，和您现在开办这样一个性文化的展览馆，这个当中您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刘达临：**回顾这十几年的性学研究，我觉得社会在发展，我这个工作也在发展，但是障碍、阻力还是始终存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杨澜：**好像一开始您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您的妻子也不太赞同，因为她办公室里的同事会说“您丈夫怎么写这样的文章”？

**刘达临：**是。当时有两个我很亲的人，都反对我研究性学，一个是我的上级，顶头上司，当时是我们上海大学文学院

党委书记，他非常关心我，他说：“听说你现在研究性学了，这个是很危险的。你研究婚姻、家庭不是挺好吗？将来你会犯错误的”。他是关心我。还有我的太太也反对，她觉得难为情，她是个医生。因为我经常写这方面的文章，“刘达临”很受注意，她一到单位上班，她的同事就跟她开玩笑“你们家老刘又写性文章了”。她觉得难为情，就说：“不准你写了。”我说：“不行。”最后我们达成协议，我可以写，可以发表文章，但是用笔名。但是这个过程已经过去了。

**杨澜：**那么为什么面临那么多的阻力你还一定要做这件事呢？

**刘达临：**我觉得这是对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造福于社会，使社会稳定，使夫妻幸福，而且造福于子孙后代。这件事是被误解、扭曲了，这个路是要开拓的，我就希望能做点新的事情，做别人不敢做但又需要做的事。

**杨澜：**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夫妻离婚时提出的理由大多都是感情破裂，或者是感情不合。但是到了90年代的时候，差不多有34%的离婚案都是以性生活不协调为理由的。人们公开地敢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这种转变？

**刘达临：**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进步，因为过去人们认为，对性方面有计较、有考虑是难为情的。我记得1983年暑假，我领着几个同学到上海长宁区民政局做调查，我们就分析了离婚案件，其中很多原因就是感情不合。我们访问了很多当事人，问什么感情不合？最后发现很多所谓感情不合，都是性

生活不协调。那时候人们还难为情，不愿公开说“我们性生活不协调”。

**杨澜：**这怎么能告诉别人呢？

**刘达临：**对。但到了90年代有了很大的改变，人们开始认为性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需求，如果在这方面得不到幸福的话，那是有非常正当的理由来提出离婚的。我觉得这是个社会的进步。



作者近影(2001年4月)

五千年未第一展  
中华性文化博物馆

費孝通

提倡性文化  
反对性愚昧

吴阶平题

